# 目　录


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黄一欧（1）
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谢慕韩（17）
一九二七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唐菊庵（34）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饶少伟（37）
一九四四年薛岳撤军湘南的打算……贺执圭（58）
衡阳会战中的鸡窝山战役……罗文浪（62）
关于南岳游干班的回忆……宋　涛　罗文浪（65）
西南干部训练班及突击队……李　昊　熊壮猷（75）
记邵阳永和金号惨案……徐君虎（89）
永和金号惨案的审理经过……汪　廉（102）
特务傅德明陷害新化学生案始末……李惕乾（110）
我在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围剿"中倡议碉堡政策的始末
……戴　岳（115）
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何汉文（125）
浙桂系与ＣＣ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苏　民（156）
我所知道的中统……刘　恭（179）
军统特务在武汉制造的一件血案……余定华（218）
回忆蔡松坡先生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唐希抃（223）
黄兴上孙中山论革命计划书（附黄一欧、李书城跋）……（229）


**补充和订正**


关于第一次"围剿"史实的补充订正……李家白（237）
樊锥不是蔡松坡的母舅……唐希抃（240）
关于《回忆秋瑾》的订正和补充……三希孟（2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

黄一欧

一九二〇年冬谭延闿在湖南被迫下台和赵恒惕上台后惨杀李仲麟等的经过，仇鳌先生的《〈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续述》（刊《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和姚大慈先生的《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刊《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和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后者题作《程潜、赵恒惕合作驱逐谭延闿和李仲麟等之死》），都有所叙述。看了两文以后，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稀如在目前。特就当日所耳闻目击的，写点片断回忆。此稿写成后，承老友阎幼甫先生在病中校阅一遍，并补充了若干材料。附此致谢。

（一）

一九一九年秋，我由上海回到长沙，赁居通泰西街。次年九月，因患伤寒病很严重，住在湘雅医院治疗。中秋节过后不久，忽然接到孙中山先生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嘱约阎鸿飞（幼甫）、杨丙（仲恒）两人速即去沪，但未说明事由。我急于赴沪应召，而院长颜福庆则说危险期虽已过去，还不能马上出院。于是，先派人将电报送给住在长沙东乡的杨丙和幼甫（杨住椰梨市，幼甫住洋石塘），嘱咐他们快进城来；过了两三天，他们都来了。就在出院的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三人，搭日轮“湘江丸”离开长沙，迳往上海。

我们到上海后，住在跑马厅一品香旅社。第二天上午，同往

法租界莫利爱路（现在更名为香山路）二十九号谒见中山先生。孙先生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这天，他是在楼上小书房里接见我们的（平时接见宾客，一般在楼下客厅）。坐定以后，我把张敬尧出走后湖南军政方面的形势和谭延闿的态度概略地作了汇报。孙先生指示：

“现在的局面必须打开。由广东北伐，湖南首当要冲；湖南的动静，关系西南大局。谭延闿不是革命党，他不会死心踏地跟我们走的，所以湖南每次的革命都没有成功。”

至此，孙先生指着我说：

“湖南这个地方很要紧。从前你父亲的部下在那里的很多，事情比较容易着手，所以找你们来商量。我请道腴先生（周震鳞）回湖南活动，你们迟来一步，他已经搭船走了。你们回去后，看情况变化，如果谭延闿不愿意革命，就把他拿下来；谁把谭延闿拿下来，我就让他做湖南督军。”

我回答说：“谭延闿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听说北京和广西都有他的亲信代表。他惯于‘见风使舵’，对于革命党说话时，从不讲一句真实话，所以很难望他同我们走一条路。”

中山先生这时有些激动地说：“那就把他立即赶走，不要他！”

幼甫接着说：“先生，现在革命不比从前。谭延闿有一套圆滑做法，他明知处于四面楚歌中，却要多方挣扎。湖南的情况很复杂，内部不一致。正因为有这种不一致，我们可以想方法将其中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将领运动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北伐的光明大道。但是，话虽这么说，很难立即做到。我们回去后就积极进行，只等广东的北伐军达到湖南境界，谭延闿的地位，就会如他几年在癸丑革命时所说的‘瓜熟蒂落’。”

中山先生问：“他说过什么‘瓜熟蒂落’？”

幼甫解释说："谭延闿在癸丑革命时，在革命党的严重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随后又取消独立，投降袁世凯。报上曾披露过他致徐世昌的密电，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

幼甫这么一说，中山先生笑起来了。他沉思有顷，随后说："你们先去进行，赶紧运动。"接着又说：

"你们找居觉生（居正）拿点旅费，赶快回去，多多联系同志，遇事多和道腴先生商量。"

此外，中山先生还讲了一些有关革命和由广东北伐的道理，极力主张湘军直捣广西，切断桂系的后路。孙先生的谈话语重心长，富有启发性，我们听了非常感动。在谈话结束将要告辞时，先生手谕批发旅费两千元，叫我们到居正那里去领。我到贝纳路找了居正，他借口一时拿钱不出，只给了一千二百元。事后得知，中山先生这次把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几万元，以一部分交给道腴先生，作回湘活动经费。

我们在上海逗留三四天，见了孙先生两次，即搭船回长沙。过武汉时，在汉口日租界某旅社会见了道腴先生。大家对湖南的情况作了分析，并就今后如何开展活动交换了意见。道腴先生在汉口稍有耽搁，我们先回长沙。到长沙后，杨丙和幼甫都住在我家。道腴先生随后也来了，记得他是住在东茅巷一位亲戚家里。

我们是在十月中到长沙的。当时，张敬尧出走才四个月，谭延闿以一身兼任省长、督军和湘军总司令，大权在握，炙手可热。赵恒惕为湘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湘军正规军仅有第一师一个师，下辖三旅，由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分任一、二、三旅旅长。在总司令之下设总指挥，而所指挥的部队仅有自己的一个师和一个鄂军步兵团（夏斗寅任团长），这种叠床架屋的搞法，

正反映出谭、赵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也正是这个原因，赵恒惕以退为进，多次请求撤消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延闿迟迟不予批准。除了正规军以外，湖南的地方部队名目繁多，各据一方，设卡征税，拥兵称雄。谭延闿以督军兼署省长名义，于九月间发表地方军编区方案，任命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罗先闿、刘叙彝、李仲麟、陈嘉祐、蔡巨猷、田镇藩、李韫珩、林支宇、萧昌炽等为第一至十二区司令。这批人中：吴剑学于一九一六年秋谭延闿二次督湘收束军队时，由二师四旅旅长调充第一区守备司令；罗先闿所部久驻湘南，一九一六年春望云亭在零陵宣布独立时，任湘南护国军第五团团长，曾率部赴郴桂宣布独立；刘叙彝于一九二〇年春击败廖湘芸部，任五区右翼联队司令，同年七月，冯玉祥部由常德撤出后，进据常德；李仲麟是程颂公（程潜）的老部下，一九一六年随程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陈嘉祐在一九一六年夏由谭延闿转荐回湘（同时被荐回湘的还有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任护国第一师第四梯团长，汤芗铭出走后，任第二师四旅旅长，旋调三旅旅长；田镇藩原任第五区司令；李韫珩系六月十一日张敬尧火烧镇湘楼出走后，次日率湘军进入长沙的；林支宇时任警务处长，区司令职务交由副司令唐荣阳代理；萧昌炽曾任督署副官长，后任零陵县知事代理零陵镇守使，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当时，湖南军官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政治态度也随之各异：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陈嘉祐、唐义彬（督署参谋长）等均与赵恒惕为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他们是拥谭拥赵的，特别是宋、张两人拥谭更为坚决；刘叙彝、蔡巨猷、田镇藩等人都是前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的旧部，周被廖湘芸刺死后，他们反对廖湘芸，接近谭延闿，也算是谭派；廖家栋、李仲麟不属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官系，他们都是程颂公的旧部，可以说是程派；罗先闿出身行伍，他是无所谓的，可算是中间派。

在政治方面，谭延闿在驱张运动结束后，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相标榜，主张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实行联省自治，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他下令召开自治会议，请省议会制定全省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活动，俨然马上就要“还政于民。”为了粉饰太平，表示驱张以后，励行文治，谭延闿还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名流学者”来湘讲学，大开“学术讲演会。”章太炎到长沙后，我曾会见数次，他书赠的几幅对联，至今还保存着。张继于清光绪年间应先君之邀，到明德学堂任教，这次算是旧地重游。蔡元培这次在长沙做过七次讲演，他在第一次的讲演中谈到近几十年湖南人发展的时期，可分三期观察：一、湘军时代，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同时死战立功诸人；二，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的人才；三、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后来又有蔡锷等护国反袁，恢复共和。在以后的几次讲演中，又谈过《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等等。

当时，中山先生对于谭延闿，除了派人来争取之外，还直接打电报给他，劝他出兵广西，直捣桂系军阀后路。而徐世昌则授意范源廉以同乡关系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这位八面玲珑的督军，一时举足轻重，成了南北双方争取的对象。各方面来到湖南活动的人很多。中山先生派来的人，除道腴先生外，我所接触过的，还有旧国会议员李执中、李汉丞、陈嘉会等。李执中是临澧人，过去属于中华革命党的；李汉丞系衡山人，曾任湖南高等

审判厅长；陈嘉会回湘后，住在陈嘉祐处，他在谭延闿面前活动最力。此外，柏文蔚和覃振也由中山先生派来长沙活动，柏住西区朝阳巷，覃住都正街，我和他们多次见过面。至于姚大愿、大慈兄弟回湘进行活动的情形，程子楷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过，并怂恿我和他们见面。我觉得没有必要，故未晤谈。（程与赵恒惕在日本士官六期同学，此时在赵的司令部作客卿）。

如上面谈到的，各方面的人接连来湘活动，谭延闿却胸有成竹，毫无表态。他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超然于南北政府之外，游离于粤桂之间，实际上是倾向桂系的。至于谭延闿手下的实力派领袖赵恒惕，清末即到广西工作，辛亥广西光复后，随王芝祥出来组织湘桂联军，他对广西方面一直保持好感，政治上倾向政学系。无论是谭延闿或赵恒惕，对中山先生的态度，都不是心悦诚服的。中山先生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湘活动。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考虑到，要想公开活动是比较困难的，单刀直入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另觅迂回曲折的途径。我们回到长沙后，和谭延闿虽有几次见面机会，仅止于普通应酬，不便率直进言；就我个人来说，他是世交长辈，说话时总感到有些拘束。对于赵恒惕，情况却是两样：杨丙和他是日本士官同学，又和湘军有段历史渊源（他和杨宇霆有密切关系，早年曾代表湘军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处联络），比较容易接近；幼甫长于应酬交际，又很健谈，他跟赵恒惕虽无深交，也常来往；我和赵恒惕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九一二年他在南京第八师任旅长时，彼此过从很密，这次在长沙又时常会面，相处甚融洽。他住在东门捷径吊楼子公馆，田凤丹时由湘西解职晋省（他与赵在日本士官同学，又系第八师老同事），住在落星田，我们几乎两三天见面一次，地

点不在赵家即在田家，经常到的还有鲁涤平、宋鹤庚、胡雨屏等，无非是打牌消遣，逢场作戏。尽管如此来往密切，有些话还是不好直率谈出，因为赵为人阴狠，拥兵自重，也以联省自治相标榜，并不乐意听中山先生的话。在此情况下，我总是从远处、大处谈起，拐弯抹角地透露出中山先生的意图，希望他顺应潮流，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我当时谈到湖南人应当团结一致，不要互相猜忌，把力量自相抵消了；不要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而要设法打开大局面，努力向外发展；中山先生豁达大度，对湖南局面非常关心，希望湖南人做一番革命事业。并且谈到谭延闿在粤桂战争中名为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中间偏桂，这种两面敷衍的态度，终归是不会见信于双方的。如果谭不择善而从，拥护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赵应取而代之，这是义不容辞的。赵恒惕对于我的这番好言劝告，表面上态度很矜持，实则已经有所动心了；否则，后来张振武团开到长沙北门外驻扎，他怎能不闻不问呢？配合正面争取，我们有时也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时有老同盟会员胡典武，是赵恒惕的小同乡，正在赵处作食客，极为赵所信任。胡典武富于正义感，有爱国热情，和我的交谊也不坏。我有时就请他通过宾主关系向赵疏通，使不便明言者得以委婉转达。平心而论，胡在这方面出力不少。此外，省议员赵子威是赵恒惕的堂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赵的机密，友朋间戏呼之为“威亲王”，赵的妹夫李醉吾，时任电政监督，我们有时也通过他们去影响赵恒惕。

谭、赵而外，其余的军官是比较容易说话的。如叶开鑫是赵恒惕的死党，有人说他是赵恒惕身边的“赵子龙”。他和幼甫在江南第九镇同事，又是把兄弟，和我的私交也很好，我们时常见面，无话不谈。廖家栋的第二旅调驻长沙，他是程颂公的旧部，

处事比较谨慎。幼甫同他谈过倒谭的事，他很恨谭，但不愿为倒谭的戎首，只能暗中支持倒谭运动。李仲麟是倒谭最积极的，他的司令部在醴陵，所部六营，实力雄厚。他本人时常来长沙，住在该区驻省办事处（浏正街聂云台宅，过去作过德国领事馆）。李仲麟经常和我见面，他多次对我表示过希望程颂公重回湖南，私下常骂谭延闿。和张辉瓒磨擦得厉害。我站在朋友和同乡的立场，总是劝他遇事谨慎为佳，不要太露锋芒，遭人嫉妒。他和幼甫的交谊最厚，常常向幼甫请教军事学，自称“弟子”，喊幼甫做“老师”，并将他在长沙史家巷自置的公馆让给幼甫住。幼甫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劝他对张辉瓒只能貌合神离，万不可针锋相对，以免张的暗箭伤人。幼甫曾为他们奔走调停，他们都写有亲笔信言归于好，由幼甫转交。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表面文章，赵恒惕杀李仲麟等人的计划，传说就是张辉瓒拟定的。此外，我们和夏斗寅、蒋锄欧（当时任团长，是赵恒惕的亲信，有“蒋门神”之称）等的交往密切，可以谈知心话。有些地方军官，我们也相机争取。如岳临警备第一团团长王承荫是幼甫的姐夫，第二团团长陈迎祥是幼甫的同学，他们都是可以吐露真情，极力团结的对象。

由于谭延闿一意孤行，不顾大局，倒谭运动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十一月十三日，平江县城发生兵变，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被杀害，营长于应祥被推举代理司令，宣布独立。原来，江道区司令刘梦龙，也是程颂公的旧部，八月间被谭延闿下令免职，所部改编为十二区守备队，归新任区司令萧昌炽指挥，由永兴移驻平江。萧昌炽是谭延闿的心腹，守备队官兵对他极为不满，蓄意谋害。平江兵变，名为兵士闹饷，实系倒谭运动的序幕。在这前后，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七团团长郭步高率部移驻水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河（张部后来又进驻长沙北门外），原驻平江的游击司令张伟民部，也移驻到长沙东乡大桥，隔省城仅三十里。山雨欲来风满楼，谭延闿知道他的一统江山坐不稳了，便于十一月十八日，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并请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同时指定廖家栋兼任省会临时戒严司令。这次会议内容，外间知道的人很少。我是从胡典武那里得到消息的。四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仲麟、张振武、郭步高、于应祥、张智等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谭延闿去职。这个“兵谏”通电发出后，一时省会骚动，局势紧张。谭延闿看到众叛亲离，形势越来越严重，于二十三日再次召集军政负责人和各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宣布即日解除军政职务，坚请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并由省议会另选临时省长。赵恒惕在会上对谭延闿的求去没有挽留的表示，只声明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会治安。这个消息也是胡典武特地到我家来告诉我的。他一再通风报信，很可能出于赵恒惕的示意。

我们得到谭延闿宣布去职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天晚上，杨丙、幼甫、柳聘农、陈方度、李葸吾等多人聚集在我家里。大家商议一番，决定贴出湘军总司令的布告，使外间知道谭延闿已经倒台了。布告是由幼甫起草的，义正辞严，确是一篇有力的讨谭檄文。据幼甫最近回忆，布告的大意是：谭延闿以一乡愿，黄缘时会，三次督湘。如果逆取顺守，能以公正政治领袖之心为心，理宜整军节用，努力建设，团结湘人，发扬刚毅之风，以作革命前卫。乃竟植党营私，犹豫泄沓，压榨群黎，挑拨袍泽，以致马嘶人怨，舆论哗然。倘再任其柔愎自用，坐肆迁延，势将又陷湘人于浩劫。本总司令受各军拥戴，出维治安，促谭离境。湘政根本改革，责任全在后贤。大权属于省民，省长亟待民选。……

在草拟这篇布告时，大家说：对谭延闿不能骂得过分。主稿人感到很为难，不大好措词。其中“乡愿”、“黄缘”、“逆取”等字句，都经过再三推敲，寓意深刻。所谓“逆取”，指谋杀焦、陈，不作“革命前卫”，指其倾向旧桂系，反对孙中山。“马嘶人怨”，指“马嘶团”之不得人心。“柔愎自用”，是当时流传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评论：吴佩孚刚愎自用，段祺瑞刚愎他用（指听任徐树铮乱搞），谭延闿柔愎自用。

布告落款只署“湘军总司令”，而未署姓名。出布告没有印信怎么办？柳聘农顺手拿了我的三妹德华（当时她在周南女校附属小学读书）的一方砚池，翻转过来刻了一颗湘军总司令的篆文大印，非常逼真。聘农刻印之后，坚持要在布告上总司令名义下署幼甫的姓名（阎鸿飞），说他在辛亥光复后当过湖南军务部长，资望相当。幼甫不以为然，说：“如果写上我的名字，那就真是光杆总司令，不好，不好！”这篇无名总司令的布告，立即分抄了几十张，连夜贴在北门一带。次日早上，围看布告的人很多，谭督军的倒台消息，立即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论中心。这是倒谭运动中一段有趣的插曲。

谭延闿去职后，赵恒惕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总司令的职务，于二十四日就职。二十五日，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二十七日，谭延闿离开长沙去上海。第二天，谭所搭轮船过岳阳城陵矶附近，与由上海载运谭妻灵柩回湘的轮船相遇，而无法停靠。谭原想等候运柩轮船到长后再走，但因形势所逼，未能如愿。他后来在上海写信给朋友，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据胡典武事后告我，谭到上海后，湖南当局曾送他一笔光洋十万元的重礼，可见赵恒惕的上台，是花了不少代价的。听说谭延闿在上海作寓公时期，赵恒惕还每年致送生活费两万元。虽然如此，谭

并没有忘记赵恒惕对他的打击。谭、赵之间从此矛盾日深，结下了深仇大恨。谭延闿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官运亨通；赵恒惕在这个反动统治集团中却从没有抓到实权，这与谭延闿的睚眦必报，大有关系。

谭延闿出走后，林支宇由警务处长而升任临时省长。林虽位居省长，并不能参与赵恒惕的机密。他对赵唯命是从，而赵则大权在握，俨然是个太上省长，重大的省政措施都要秉其意旨办事。林不敢独断专行。例如，我之出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就不是由林省长决定，而是由赵总司令指派的。十二月初某天，赵恒惕托胡典武来向我致意，说石醉六请辞长沙市政厅长，拟将市政厅改为市政公所，要我担任市政公所总理。我因为赵刚刚上台不久，时局还在动荡中，推辞不愿担任，胡典武说："赵炎公（赵恒惕号炎午）认为市政建设很重要，你在外国的时间久，见识多，出长市政，最为适宜，一定要请你帮忙。"赵恒惕和我见面时，也是这样表示。经他再三敦促，我自己考虑到借此可以在家乡做一番事业，而孙科当时也正担任广州市长，因此答应下来了。其时，市政公所每月仅有经费五千元，还不能按时领到，要拿财政厅的拨条到省河厘金局去抵借。可是，在赵恒惕的本意，却是以此为酬庸工具，来报答我帮助他赶走了谭延闿。谭延闿则因此对我怀恨甚深。一九二八年安徽省政府改组时，蔡元培、孙科等在南京行政院会议上联名提出我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谭延闿时任行政院长，他坚持不同意，结果没有通过。会后，蔡元培派车接我去大学院谈话，他劈头就问："你和组安先生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说："别的没有，只是民国九年在长沙赶走了他。"蔡先生连说："难怪，难怪！"接着，他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叫我不要介意。

## （二）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长沙城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流血事件。被害的人多是湘军现役军官，计有六区司令李仲麟、二旅四团团长瞿维臧、第一师司令部执法官萧泽源、二旅四团团附曹广遂、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烟酒专卖局局长张自雄、湖田局局长叶隆柯等人。这是一次经过缜密布置的有计划的大屠杀，惨遭牺牲的大多是拥程倒谭的人物。

这天上午，我在通泰西街私宅为回湘省亲的林镜南（长沙人，时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司长）设宴洗尘，并邀彭允彝、李醉吾、杨丙和严幼甫等人作陪。李仲麟也在被邀请之列。别人都来了，他却没有到，听说回长沙金井乡间李家祠堂挂匾去了（李仲麟是农民家庭出身，青年从军，超升很快。当了司令以后，乡下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宗族间对他更是捧得很高。李在倒谭之后，动了“衣锦还乡”的念头，趁“冬至”回乡祀祖，到祠堂上匾。他的字学黄山谷，写得甚好，也学做诗，俨然儒将风流，恭维他的人很多。因此，更助长了“踌躇满志”的情绪，平日麻痹大意，以为赵恒惕对他莫可奈何）。

当天晚上，我试打了一次电话到六区办事处询问，李仲麟自己接电话，说他下午刚进城，没有来陪客。我问他那里有人客没有，他说只有周介绸（新任警务处长）在，没有外人，要我和幼甫去谈谈。我邀幼甫同去，刚走到泰安里口叶开鑫住宅前面，卫兵问“口令”，我们回答了；再问“特别口令”，我们答的不对。卫兵正要阻拦，幼甫情急智生，说：“我们是来会叶太太的。”到了叶家一问，才知道是临时换了口令。我由叶家回到自己家里，已是十一点多钟了，想到情况有变化，要给朋友打个招呼，于是再打电

话找李仲麟。我在电话中说："季雋兄，我们本来是来看你的，临时到叶家去了一趟，不来看你了。今晚换了特别口令，你要注意些！"他大意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怕什么！"

这天深夜五点多钟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以前），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有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李仲麟被杀死了（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我至今还猜度不出）。清早起床后，我家的厨工进来对我说：他上街去买菜，被门口站的带红布条子的枪兵拦阻住，不准通行。过后不久，哨兵就撤走了，街上没有动静。早饭前，刘重（号谦实，资兴人，旧国会议员）匆匆跑来，说在北正街碰见刘重威（邵阳人，当时在赵部任营长。一九二六年任第三师旅长，被唐生智在衡阳处决）骑马招摇过市，厉声地问他："你在外面跑什么！"刘重胆小怕事，通过我和连士清（在美领事馆任翻译）的关系，躲进了福星门外的美国领事馆。随后又有人来告，李仲麟被杀后，头被割下来挂在多福寺（今解放路柑子园口）门口电线杆上示众，他的妻子则抱着无头尸身痛哭不止。

我听到良友惨死，为之忧心忡忡。随即打电话给夏斗寅，请他来我家一谈。夏来到以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李仲麟被杀的事，他说："早已知道了，死了七八个，不止李秀雋一人。"他接着说，赵恒惕昨夜在他那里待了大半夜，到天亮时才回司令部去。我邀他同去见赵恒惕，他答应了。当我们走进湘军总部赵的办公室时，只有总部参谋长唐义彬、秘书长钟伯毅和首斌在座，赵恒惕靠着一张椅子在烤火，神情恍惚，默然无言。我问他："昨夜死了这么多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郑重其事地辩白说："我只圈了李仲麟一个人！"我说："李仲麟的脑壳挂在多福寺门口示众，省会之地，观瞻所系，这不大好！"他听了我的话，对夏斗寅说："霖

炳（夏斗寅别号），你去负责收殓一下。”随手批了一张发洋五百元的条子交给夏斗寅。李仲麟被害后，就是由他照料收殓的。事后听人家说，张辉瓒拟出的黑名单上多至四五十人，我和幼甫的名字都列在其中，而没有杨丙（可能因为他们是日本士官同学）。这次屠杀，是赵恒惕根据张辉瓒拟的黑名单圈定后，交叶开鑫执行，直接指挥杀李仲麟的，为营长赵茂林，其人与李有宿怨。叶开鑫事后对幼甫说过，那次杀李仲麟等，他事前并不知道，当时奉命随即执行。可见赵恒惕对我说他只圈了李仲麟，显然是自行撒谎，欲盖弥彰！总之，在谭派死党张辉瓒看来，这些人是拥程倒谭的罪魁祸首，势在必去；在赵恒惕眼中，李仲麟等飞扬跋扈，终是心腹之患，因此，刚刚上台一个月，就认友为敌，悍然伸出了血手。

李仲麟之死，固然是赵恒惕、张辉瓒等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屠戮（据传事机极密，连身居临时省长的林支宇也未预闻），但他自己的麻痹大意，丧失政治警惕性，也是致死之由。记得一九三〇年冬在上海时，李午云（平江人）对我谈过：一九二〇年他在六区司令部担任参议，李仲麟回金井宗祠挂匾，他适在长沙，听到外间谣传赵恒惕将不利于李，便赶往乡间通风报信。李在半路上遇见李仲麟坐轿子进城，告以外间风声很紧，劝他莫进城去，速由榔梨、渌口绕道回醴陵，免遭毒手。李仲麟却毫不在意地说：“赵炎午现在不敢动我的，他还在拉拢我，答应将我们的部队编师哩！”谁知“世路风波险”，就在这天深夜，李仲麟竟成了赵恒惕的刀下鬼。

十二月二十五日，赵恒惕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宣布李仲麟等罪状，说李仲麟、瞿维臧等谋乱有据，拿获正法。廖家栋于惨案发生后出走武汉，第二旅旅部及所属第四团均被解散，叶开鑫升任

二旅旅长兼省会戒严司令，他的安民布告也随即贴满街头了。至于李仲麟的部队，则被张辉瓒等就地解散。一九二一年，程颂公追念死者，作过一首《悼七士》的五言古诗："愚者多嫉妒，庸人每残贼；忠义匪所存，利害易为惑。吾党盛秀士，夙志剪荆棘；奋起乡闾间，行义如不克。一时殉权者，岂不借其力；宵游方从容，晨起已锄殛。始知争逐际，祸福未可测。哀哉二三子，含冤痛沉抑！"有感而发，情见乎词，是那个仕途黑暗、朋党倾轧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关于易象临难时写的绝命诗，仇鳌先生记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救乡救国终成梦，留取他生一恨吟！"姚文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爱乡爱国都成梦，留得来生著慧林！"刊诸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时，其结句是："□□□□未了因"。据我回忆，三者都有出入。这首当年传诵一时的绝命诗，原文是这样的：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易象遇难后，程颂公致送遗属光洋一千元。他的次妻（易的元配是田汉同志的舅母，现在年近九十，住北京）辛景林，为纪念丈夫殉难，在长沙李文玉金号打了一块带链子的金牌，随身佩带，牌子上就刻着这首诗。后来，辛景林曾将这块金牌拿给我们夫妇看过，故印象最深，至今犹能记及。易象号枚臣，长沙人。一九一五年秋，蔡松坡密谋起兵讨袁，我奉先君之命由美国回到日本，有所策划。其时，易正亡命东京，我们初次订交。后来他在上海办晚报，又常来往。一九二〇年被害前不久，程子楷告诉我说他来了，住在落棚桥某亲戚家。我曾去看过他一次，匆促间未及深谈，不料竟成永诀。

**编者按**：关于易象临难时的绝命诗，我们查阅了《曹孟其日记》（未刊稿），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下云："易枚臣临死尚有绝命诗一绝。或传其辞有'爱乡爱国终成梦'之句，可谓从容极矣。'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曹孟其，长沙人。谭延闿三次督湘时，任湖南督军署秘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